

论商族骨卜习俗的来源与发展

朱彦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 商族很早就有用兽骨进行占卜的习俗。商族是受其起源地及其周围地区固有的较盛的占卜风俗传统的影响, 形成了骨卜占卜的习惯。在商族迁徙、发展的过程中, 又不断吸收和借鉴周边民族的占卜概念与技术, 尤其是商人使占卜与文字结合, 把占卜过程与结果书契于占卜的兽骨龟甲之上, 形成了商人独特的甲骨文化, 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的早期文明时代的史料, 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 商族; 骨卜; 来源; 发展

上古民族于愚昧、懵懂之时, 没有明确、科学的决策模式, 大凡行事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求助于冥冥之中的天帝、鬼神的旨意, 这就是占卜。“卜以决疑, 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 占卜之术就是用来“决嫌疑, 定犹豫”(《礼记·曲礼上》) 的。这是春秋战国之时人们对占卜的一种解释。但是对于此前尤其是商代人们来说, 占卜之术并非仅限于“决嫌疑, 定犹豫”, 而是商代人们的一种极其普遍的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商代人们时时卜, 事事卜, 甚至一事多卜, 占卜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项重要事情。有些事情是问诸鬼神的, 有些事情则是自然会发生的, 他们也要占卜。所以这个意义上的占卜, 就不是“决嫌疑”一词可以概括的。

应该说, 商族以兽骨进行占卜的习俗很早就有。在迁徙、发展的过程中, 又不断吸收和借鉴周边民族的占卜概念与技术, 使得这一古老的占卜之术在商人手中发扬光大, 达到了它有史以来的顶峰状态。尤其是商人使占卜与文字结合, 把占卜过程与结果书契于占卜的兽骨龟甲之上, 即是所谓的甲骨文, 形成了商人独特的甲骨文化, 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的早期文明时代的史料, 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商族骨卜技术的渐进

商族和北方其他早期民族一样, 较早时期只有骨卜而没有龟卜。这在先商文化各类型遗存中, 都有骨卜材料的发现。这表明了商族在迁徙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这一古老的占卜习俗, 并且在技术上有较为缓慢的演进。

我们认为, 商族起源于京津塘地区的环渤海湾一带, 包括唐山大城山遗址在内的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 可能就是商族最早的物质文化遗存, 是先商文化漳河类型的祖型和前身¹。在大城山遗址中, 就有了骨卜材料的发现。据发掘报告, 该遗址共发现卜骨四块, 其中三块为牛肩胛骨, 一块为鹿肩胛骨。骨面的钻凿形态为有灼无钻, 灼痕多在肩胛骨的背面, 一般比较密集而不规则。其中有一件较为完整, 上有七个灼痕, 骨臼、骨脊均削去, 打磨光滑, 并将骨臼对称的一边削磨成偏刃形。粗制的有的将骨脊只削去一半, 骨面稍加刮治²。也就是说, 大城山卜骨的材料为牛肩胛骨和鹿肩胛骨; 其攻治方法为, 三块是简陋的刮治, 一块的骨臼、骨脊削去, 并经打磨; 钻凿形态是直灼无钻。哑叭庄遗址一期文化层中出土了三件卜骨, 均残。H106:2, 牛肩胛骨, 长 34.4 厘米; H80:14, 羊肩胛骨, 残长 9.7 厘米。骨臼、骨脊均未修整, 只有灼痕³。这一切都无不显示了较早时期占卜技术的原始性。但是像骨臼、骨脊的切削, 刮磨光滑, 正是典型的商代卜骨整治模式, 而发现于先商文化各种类型遗存中

¹ 朱彦民《商族起源新论》,《孟世凯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待刊。

² 河北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³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的卜骨，也大都坚持了这种作风。商代晚期的占卜之风可谓渊源有自。

先商文化的保北类型，卜骨材料的发现不多。目前属于保北类型文化的卜骨只在涑水富位遗址第三期遗存中有所发现。卜骨三件，均为牛肩胛骨。其中H1:30、31，骨面经过修整，骨白以下刮出平槽，槽内施钻，钻窝较深，兆痕清晰⁴。虽然材料有限，不足以说明问题。但从这仅有的材料来看，此时的卜骨钻凿形态介于大城山卜骨和先商文化漳河类型卜骨形制之间。

商族由渤海湾一带向南迁徙到达了华北大平原。先商文化漳河类型是商族在豫北冀南地区长时间居住而遗留下来的遗迹，是所谓的典型的先商文化遗存。在河北邯郸涧沟、磁县下潘汪、下七垣、内邱南三岐、永年何庄以及邯郸峰峰矿区北羊台等先商文化漳河类型遗址中，都发现了商族早期的卜骨材料。

邯郸涧沟遗址属于先商文化漳河类型的遗物中，发现有“卜骨共三件，二件为牛肩胛骨，一件为狗肩胛骨，未经修治和钻凿而直接灼的。肩胛骨薄的（狗的）易灼，灼痕轻；肩胛骨厚者（牛的）不易灼，灼痕大而重。他们与龙山卜骨的不同点是，均在骨脊的侧面有灼痕，骨脊处很厚，甲骨的薄处空处很大。”⁵

永年县台口村龙山文化（应是先商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卜骨一件，“T24②:2 制法比较原始，系用牛的肩胛骨，骨白残去，骨脊未削，只有灼而无钻凿痕迹。唐山大城山和邯郸涧沟所出土的与此做法也相同。”⁶

磁县下七垣遗址第三层遗存中，发现残块卜骨十二件。“多数为牛肩胛骨，也有羊肩胛骨。骨料经过整治，骨白削去一半，骨脊削平。多数只有凿、灼，其中有一片两面都有凿灼痕。”⁷而下潘汪遗址先商文化遗存中只发现一件卜骨，系用鹿（羊）的肩胛骨制成，骨脊、骨白均不切割加工，无钻无凿，只有灼痕而已⁸。

河北永年何庄先商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卜骨，但为数不多，见诸报道的只有两件，且均已残泐。“T9②:37，为猪肩胛骨，一面有几处灼痕，无钻凿现象。残长 16.2 厘米。”⁹

而新近发现的邯郸峰峰矿区北羊台先商文化遗址中，发现了 7 件卜骨，惜均已残。“H2:7，系牛肩胛骨。一边有两个灼烧成黑色的不规则孔，无钻凿现象。残长 31.6 厘米。H1:8，系猪肩胛骨。一面有 6 个灼烧的黑色印痕，亦无钻凿现象。残长 16.4 厘米。”¹⁰

总之，此时所用卜骨，一般用牛或猪的肩胛骨做成，大多数是无钻无凿，直接施灼。而少数的卜骨已开始有了钻、凿、灼三者并施的现象。或先用工具（不是铜钻）挖成圆窝即所谓“钻”，然后灼¹¹。这相比大城山时期的无钻而灼，还是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与保北类型文化时期的卜骨整治，并没有太大的发展，这表明了卜骨的使用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的物化，其发展演变极其缓慢。

在此之后就是先商文化的辉卫类型，是商族由北向南入主中原经过此地时的文化遗留。在淇县宋窑遗址中，共发现属于先商时期的卜骨 18 片，多经灼、挖。T13③:148，上有四个灼痕，与最大者对应的背面有一挖坑。坑窝周围亦有灼痕。T14④:4，现存灼痕七个¹²。在新

⁴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涑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 年第 4 期。

⁵ 河北省文物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 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10 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4 期；德海、来成《来函更正》（对《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的补充更正），《考古》1962 年第 12 期。

⁶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 年第 12 期。

⁷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 2 期。

⁸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1 期。

⁹ 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永年县文物保管所《河北永年县何庄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 年第 4 期。

¹⁰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峰峰矿区文物管理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北羊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 年第 2 期。

¹¹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 118 页，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¹²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河南淇县宋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10 集，地质出版社 1996 年版。

乡潞王坟遗址中，曾发现有先商时期的猪肩胛骨，未经整治，仅见灼痕¹³，仍显示了占卜的原始性。但在辉县琉璃阁遗址中，出土了 20 片卜骨。其中属于先商文化辉卫类型的是 H1。这第一灰坑中出土了 17 片卜骨。对这批卜骨材料，原发掘报告有详尽的描述。因为与此前时期相比，此时的占卜现象异常丰富，而且在技术方面也有了不小的进步，所以在此不憚其烦，将这些情形描述节录如下：

骨版在未卜用以前，照一般的习惯总先加以刮磨修整。由这些卜骨的形式观察，修整方法简单，技巧较拙劣，多半是把骨版的原形稍加刮磨再行卜用。

钻灼方面也相当原始，其方式有不钻而灼，钻而后灼，钻而未灼，挖而后灼四种情形。不钻而灼多施于骨版较薄处，所有灼号似乎没有一定的规则，有些灼印很深，有些仅露出淡灰色的火印；有些灼号的排列很密集，也有很疏落的……钻而后灼的多在较厚的骨版上，这些使骨面易于显出卜兆的裂痕。钻而未灼，有钻的形式而无火灼的痕迹。挖而后灼是在骨版上先用刀挖一小圆圈然后在中间用火灼。

钻凿痕迹的形态，钻口部分是很规则的圆形，纵剖面成圆柱形（平底）、圆锥形（尖圆底）和半球性（圆底）三种形状，以尖圆底为最多。

由个别情况观察，钻灼印痕是相当杂乱的。在同一骨版上钻而后灼与不钻而灼同时存在。1:1，是卜骨中最长的一块，只剩下右侧宽约 2.5 厘米的一狭条，刮治的较规则，将骨白刮去一半。骨脊完全刮平，大部分是钻而后灼，薄的部分多半是未钻而灼，钻痕多属尖圆形，仅骨白部分有两个圆柱体的平底凿痕，钻痕之间的距离略相等，其间还有辅助的灼号。

在同一骨版上也有两面灼印火号的，如 1:91，骨面修整的平滑整齐，骨脊完全削去，用锉磨光后再灼火号，锉痕纵横交错的痕迹还很显然的保存着，灼号集中在骨的某一部分，约 9 平方厘米，两面有 50 余灼号，钻而灼的 6 个灼号，其他都是不钻而灼的。

1:101 的灼法较为不同。按一般的习惯，火灼多在正面，或者两面都有。这两片上的灼号全在反面。这是用一块猪的右胛骨，未加刮磨，骨面灼了 6 个灼号，其中一个较大，其余五个很小，最小的一个直径约 0.2 厘米。灼法无规则，灼迹很浅，仅显黑印，背面亦无任何兆璽。

比较完整而规则化的，以 1:4 为代表。骨白未加刮治，在骨脊面、骨脊下凿一深槽，骨脊完全削去，都是不钻而灼的。骨面光滑上光，灼号全在骨脊面上，灼号之间的距离较规则，骨面末端较薄的地方有 5 个印痕，中间显出纵横几条裂开的兆纹。

又如 1:100 是将骨脊削去一部分仍留骨根，骨面上光，全是挖而后灼，挖灼痕迹全在骨脊面。

这些卜骨的材料大多数是牛的肩胛骨，其中有几片兽骨，我们曾经请骨脊椎动物研究室加以鉴定，结果如下：1:13、1:101、1:80 是猪的右肩胛骨，1:42 是圣水牛的右胛骨¹⁴。

对此，刘渊临先生对这些卜骨的特征作了一下简略的归纳：

第一材料：大部分是牛肩胛骨，二片猪骨。

第二攻治：粗陋，骨白未去，骨脊削平，稍加刮磨。

第三钻灼：有不钻而灼，有钻有灼，钻而不灼，有挖而灼者四种¹⁵。

刘渊临先生的结论是在没有多少资料可资比较的条件下得出的，琉璃阁的卜骨毕竟是早期占卜的遗留，其攻治技术的粗陋与占卜方法的原始都是无容置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与商族更早阶段占卜情形相比，无疑会发现其先进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质料基本上已选定了牛

¹³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1 期。

¹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琉璃阁”，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¹⁵ 刘渊临《卜骨的攻治技术演进过程之探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一分册，1974 年版。

肩胛骨为主要材料；攻治不仅骨脊削平、骨面刮磨，而且还有上光的技术；不仅有钻有灼，而且钻灼方法多样，钻凿形态各异。

鹿台岗型是先商文化的另外一个类型，地在豫东杞县一带，是商族在灭夏之前在此与东夷人联盟留下的遗迹。这里也出土了卜骨材料，但是数量不多，共有三片。其中H39:83，系用牛的肩胛骨修制而成，圆钻，钻孔直径多在1-2厘米之间，有灼痕。H9:33，似略加整治，均只有灼而无钻凿。H35:33，有钻有灼，钻窝直径约1-1.5厘米¹⁶。此时的卜骨占卜技术与辉卫类型先商文化时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可以推测两者相距时间不会太远。

先商文化南关外型是商族由豫东鲁西南西进至郑州地区、灭夏建商之前的文化遗留。由于这个地区与这个时间的特殊性，该类型文化的遗存并不丰富，此时的卜骨材料发现的也少。现发现的主要材料是牛肩胛骨，还有少量的猪肩胛骨和龟甲。如南关外下层出土的卜骨9块，多是牛肩胛骨，一般略加整治，也有不经整治的，卜法多直接灼于骨面之上；中层发现卜骨60多块，分牛、猪、羊肩胛骨三种，其中以牛肩胛骨为多，大多数是略加整治，直接用火灼于骨面，只有少数牛肩胛骨是钻后再灼；上层发现卜骨53块，其中牛肩胛骨44块，猪肩胛骨3块，羊肩胛骨6块，牛肩胛骨分为直接灼烧和钻后再灼两种，而猪肩胛骨和羊肩胛骨都是直接灼于骨面的¹⁷。这些骨料大多略经整治，未钻而灼。同样显示了该时期商族人心态的急迫与行事的匆匆。

殷商文化的二里冈期已经是商代早期了。在这个遗址商代文化层中，卜骨普遍存在，出土数量甚多。1952年出土的175块卜骨上，几乎都是单个半圆形孔，而小屯出土的卜骨上的灼孔，则都经过刮磨，而且都是复合孔，其具体形状为：沿卜骨纵向凿有一椭圆形槽，槽的中部钻有一个半圆形孔；孔突出于槽的一侧（通常在卜骨中缝一侧）。选用这种孔形的主要意图，显然是使灼烧后的裂纹尽可能规整。采用复合灼孔后，裂纹不再如仅有半圆形孔时那样呈放射状分布，而是沿卜骨上抗力最弱的两条线伸展。椭圆形槽上下和左右各有一对对称面，即沿槽的长轴的上下两端和沿槽的短轴的左右两侧；裂纹沿着这两条轴线伸展。不过，由于半圆形孔偏置于槽的一侧，所以裂纹只朝此侧伸展。因此，出现在卜骨外侧面上的裂纹，始终呈现为横卧的T字形，一条裂纹沿槽的长轴线向两端伸展，另一条裂纹则与之垂直相交，沿半圆形孔所偏置的方向伸展。

此时的骨卜技术有了更为明显的进步，占卜质料种类有了扩充，攻治技术与钻凿、火灼方法也基本趋于成熟与定型。因此，这些材料对于勾画商族占卜文化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极其重要。有关卜骨的资料，原报告有详细的描述，兹摘录如下：

（1）质料：以牛的肩胛骨最多，猪和羊的肩胛骨较少。极少数是鹿和狗的肩胛骨，龟的腹甲只发现两片，也发现一片是牛的肋骨。

（2）整治：猪、羊和狗的肩胛骨多未加整治，牛的肩胛骨整治的较多。整治方法：一种是骨白部分保持原状，只是把肩胛骨的脊根部分切去。如H10:403、H2乙:299。另一种是在肩胛骨脊根的一面，将骨白下边切开一段，把两边及脊根全部削平，如H17:60。所发现的牛肋骨，是把肋骨劈开，并稍加磨制后使用，如H2甲:341。也有极少数未加整治的，如H10:422，骨白及脊根保持现状。龟的腹甲仅在边沿部分加刀削后使用。

（3）钻法：在骨的一面灼前要先钻，钻痕疏密不等，没有一定的顺序排列，如H14:12。钻孔的底面有尖圆的、平圆的、钝圆的等种。上述的一件铜钻，就是钻骨使用的。一般是在一块肩胛骨上正面施钻，但也有少数正反面都施钻孔的，如H17:171。只有一片龟的腹甲是用刀挖成窝形再灼的。

（4）灼法：有直接灼在肩胛骨较薄的地方，这多是猪、羊、鹿的肩胛骨，而牛的肩胛骨较少。经过钻孔后再进行灼的，以牛的肩胛骨最多，也有少数龟的腹甲，在同

¹⁶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著《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¹⁷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一块牛的肩胛骨上有直接灼的或钻后再灼的。也发现有龟的腹甲是直接灼的¹⁸。

二里冈遗址从地层上也可分出上下层的先后关系来。而卜骨材料依时期不同也有不同，极具分期意义，对于描述占卜习俗的进化层次极其有利。兹援引原报告如下：

就牛肩胛骨在卜时的整治、钻法和灼法上看，在二里冈商代文化下层，整治的一般比较粗糙，不经过钻而直接灼到骨面上的比较多，钻后再灼的比较少。如H10 是属于二里冈下层的灰坑，所出现的牛卜骨，多数是直接灼上的。在二里冈商代文化的上层出土的牛肩胛骨，一般整治的比较细致，钻后再灼的比较多，不钻而直接灼的较少。但是我们在郑州人民公园的发掘中，发现了商代文化的三层重叠的堆积；中层同于二里冈期上层，下层同于二里冈期的下层，上层确实晚于二里冈期的上、下两层的，这层的出土物除陶器和二里冈期有显著不同外，在卜骨的用料和卜法上也有区别。人民公园上层出土的卜骨，质料以龟的腹甲最多，牛骨较少。而卜法上是钻、凿、灼三者兼施；整治更为细致。这说明因时间先后的不同，在卜骨上也有区别¹⁹。

郑州二里冈时期尤其是上层时期，商族的占卜技术有了更新的进展。最为突出的是出现了龟卜，这是在占卜质料上的新猷，开了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大量使用龟卜的先河。关于商族占卜中龟卜的引进与使用，详见下文专论，此略。到二里冈上层时期及其以后，用料固定于牛肩胛骨和龟甲，卜法渐趋严整，钻凿并施，整治程序复杂。这为商代后期甲骨文时期占卜技术的成熟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商代中期遗址河北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济南大辛庄、徐州高皇庙等遗址中也都发现有卜骨。

河北邢台曹演庄遗址中的甲骨，“在上下两层皆有出土，绝大多数是残片，很少能复原成整骨的。有牛、羊（鹿）、猪、龟四种。牛则多使用其肩胛骨，背面脊稍削平，骨白削去一半，呈马蹄形。另外，在T179 还发现一块系用牛的头盖骨，里面钻有二孔，并有灼痕，这在殷墟和郑州二里冈也都有发现，数量很少。羊（鹿）、猪也多用其肩胛骨，脊棱、骨白均不加整治。龟则背、腹甲兼用，边线稍加修饰。卜法：牛骨大多数有钻、灼而无凿工，少数亦有钻、凿、灼三者兼施的。羊（鹿）则只有钻、灼痕。龟除少数几片只有凿、灼或灼以外，其余大部分钻、凿、灼三者兼备。据上下两层统计结果，上层龟多，下层骨多，猪骨只见于下层。”²⁰

尤其是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卜骨材料，有些发现于居住址中，有些发现于墓葬之中。因为时代与商代后期殷墟甲骨相切近，其整治、钻凿形态对于殷墟卜骨的影响有更为直接的意义。台西骨卜共有 414 片，其中居住址中发现了 403 片，墓葬中发现了 11 片，具体情况如下：

卜骨绝大多数是用牛肩胛骨制成，只有一块是用牛的下颌骨，两块系用猪的肩胛骨。

卜骨修整方法比较原始。早期居址出土的猪肩胛骨除 T1: 17 骨白、骨脊均未加工，正面有两个钻痕，未见灼印外，其余的早晚两期居址出土的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未卜前都是先将骨白和白角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一，也有根本不切，保持原状的。

兹以商族在不同时段所用骨卜情况列以下表，商族骨卜技术演进与骨卜程式形成的变化轨迹，正可一目了然。

商族骨卜技术演进与骨卜程式形成变化表

时代	考古遗址	卜骨质料	整治方法	钻凿形态	灼兆痕迹	资料出处
----	------	------	------	------	------	------

¹⁸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郑州二里冈》，第 37 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七号，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¹⁹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郑州二里冈》，第 38 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七号，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参阅河南省文物工作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第 65—67 页，《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

²⁰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 年第 4 期。

商源时代		唐山大城山	牛、鹿肩胛骨	骨臼骨脊 削除磨光	无钻无凿	反面施灼 正面有兆	考古学报 1959-3
		任邱哑叭庄	牛、羊肩胛骨	未经整治	无钻无凿	有灼痕	文物春秋 1992 增刊
先商时代	保北类型	涞水富位	牛肩胛骨	骨面修整 臼下刮槽	有钻无凿	有灼兆痕	考古学报 1988—4
	漳河类型	邯郸涧沟	牛、羊肩胛骨	未经整治	无钻无凿	有灼痕	考古 59-10、 61-4、62-12
		永年县台口村	牛肩胛骨	未经整治	无钻无凿	有灼痕	考古 1962—12
		磁县下七垣	牛、羊肩胛骨	骨料整治 骨臼削半 骨脊削平	多数有凿亦 有两面施凿 者	有灼痕	考古学报 1979—2
		磁县下潘汪	鹿（羊）肩 胛骨	未经整治	无钻无凿	有灼痕	考古学报 1975—1
		内丘南三岐	卜骨	未经整治	无钻无凿	有灼痕	考古学集刊 1982-2
		永年县何庄	猪肩胛骨	已残似未 经整治	无钻无凿	有灼痕	华夏考古 1994—2
		邯郸峰峰矿区 北羊台	牛、猪肩胛 骨	均残似未 经整治	无钻无凿	有灼痕	考古 2001—2
	辉卫类型	辉县琉璃阁	牛肩胛骨 多猪肩胛 骨少	骨臼削半 骨脊削平 稍加刮磨	有钻无凿也 有挖槽	多有灼痕	辉县发掘报告 琉璃阁
		新乡潞王坟	猪肩胛骨	未经整治	无钻无凿	有灼痕	考古学报 1960-1
		淇县宋窑	猪肩胛骨	未经整治	无钻无凿少 量有挖痕	有灼痕	考古学集刊 10
	鹿台岗类 型	杞县鹿台岗	牛肩胛骨	未经整治	有钻无凿	灼痕整齐	考古 1994-8
	南关外类 型	郑州南关外	牛肩胛骨 多猪骨少	未经整治	无钻无凿	有灼痕	考古学报 1973-1
商代早期		郑州二里冈	牛肩胛骨 多鹿羊猪 肩胛骨少	牛肩胛骨 整治切削 骨脊骨臼	有钻无凿两 面小钻疏密 不等	一面或两 面有灼痕	郑州二里冈考 古学专刊丁种 七号 1959
商代中期		邢台曹演庄	牛羊（鹿） 猪肩胛骨	牛肩胛骨 背脊削平 骨臼削半	大多有钻无 凿少量钻凿 灼三者兼施	有灼痕	考古学报 1958—4
		藁城台西村	牛肩胛骨 多猪骨少	切去臼角 削平骨脊	有钻有凿挖 凿始见	灼痕杂乱 密集无序	《藁城台西商 代遗址》1985
商代晚期		安阳殷墟	牛肩胛骨 为主鹿骨 等参用	切除骨臼 削平骨脊 骨棱磨光	有钻有凿钻 凿并施以控 卜兆	灼痕钻凿 对应排列 密集有序	《甲骨学通 论》、《甲骨学一 百年》等书

二、商族骨卜习俗的来源

对于商代占卜中骨卜习俗的来源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识。过去倾向性的认识是，商族的占卜传统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

因为在中国考古学初期，考古工作做得较少，在殷墟之外又只发掘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子崖遗址，在那里出土了较多的比殷墟甲骨占卜技术更为原始的卜骨材料，所以一时间就有商人的占卜技术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说法。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说：“这种占卜术的更为原始的形式，在城子崖的新石器时期黑陶文化的遗存中留下了佐证。”“后一种肯定是从新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较古老的办法；这一时期的遗存以山东半岛和淮河流域为其中心。……黑陶民族究竟是否为最早使用骨卜的人，还很难断言；不过说骨卜的发源地位于龙山文化领域之内，应是有相当可靠性的。”²¹“如山东历城县的城子崖、河南安阳的晁家村和河北邯郸的涧沟村，这些地方都没有疑问底是属于黑陶文化的遗址。尤其是小屯本身先殷文化层出土的没有文字的卜骨，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习惯原始于华北东部的先史时代。”²²五十年代台湾石璋如先生也指出，出土卜骨之地均与黑陶有关，“骨卜是东方的习惯，很可能的是东夷的祖先黑陶文化的传统。”²³尹达先生也认为，“小屯文化中有不少的因素吸取了龙山遗产，并加以发展，而成为光辉灿烂的殷商文化构成的因素。”“龙山文化时代已知骨卜的使用；小屯文化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加以发挥，而成为殷代‘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系的占卜习惯。’”²⁴可以说这一说法影响很大，从者甚众。

如今，更为丰富的考古资料表明，商族人的占卜习俗与占卜技术是有其自身的渊源的，而不是从山东龙山文化学来的。

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一些较早时期的骨卜材料。从占卜技术上来说，并不比商源时代商族的人们高明到哪里去。比如，城子崖遗址下层发现的数量可观的卜骨，是最早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占卜实物，而且有较详细的地层记录和形态描述，正可拿来作为比较的参考。

城子崖出土了十六片卜骨，除了一片是在地面上捡到的，其他十五片都有可靠的层位关系。而属于龙山文化时代的只有下层所出的那六片²⁵。其中四片的材料为牛骨，一片为鹿骨，一片究为何骨不甚明了。攻治方法，三片未刮治，三片刮治，刮治的均曾上光。天然骨白，有的骨白角未去，骨脊面看不出是否去掉。有的骨脊切去一半，脊根未去。有的骨脊未去。钻凿形态，无凿有钻，其中有一片两面均有大小单钻，有两片只有一面是大单钻，其余三片均无钻痕²⁶。

尽管在钻凿形态上，城子崖比大城山在个别卜骨上多了一项钻的形态，但这些钻与商代晚期典型的T形钻凿形态相差甚远。而在漳河类型、辉卫类型先商文化时期的卜骨上面也渐渐有了钻的出现。这就是说，商族的占卜技术的演进，有其本原的历史，独自的道路，并没有从盛行骨卜的山东龙山文化那里学到多少东西。再者，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前身大汶口文化中，未发现占卜的材料（只在墓葬随葬物中发现了属于佩带饰物的龟甲片，但与占卜无关²⁷），说不定东夷族人的占卜习俗还是从商族人那里学到的呢！支持这种观点，完全可以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后继——岳石文化中找到材料。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异地同时并存。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卜骨有的地区类型有，有的地区类型无（如与先商文化有较多接触的山东菏泽

²¹ 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靠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作者于1953年秋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做的报告，刊于Annals of Academia sinica, 1955, No. 11 Part 1.

²² 李济《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21、22期合刊，1963年版。

²³ 石璋如《骨卜与龟卜的探源——黑陶与白陶的关系》，《大陆杂志》，第8卷第9期，1954年版。

²⁴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版。

²⁵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著《城子崖》，第86页，表十九，《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1934年版。

²⁶ 刘渊临《卜骨的攻治技术演进过程之探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一分册，1974年版。

²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二章，新石器时代，一、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四）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第9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曹州一带的岳石文化类型，就没有卜骨材料出现²⁸)。有卜骨出土的情况，也不尽一致。有些地方的卜骨，有灼有钻，与先商文化的卜骨相似。如牟平赵格庄H37出土了兼有钻灼痕的卜骨，有的卜骨钻孔分行排列，似为“三联钻”²⁹。这些特征在先商文化的一些遗址中也已先期出现，很难说这是商族人跟东夷人学习的结果。

商族的骨卜技术更不可能从夏人那里得来的。因为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卜骨。这些卜骨多用牛、羊和猪的肩胛骨作为质料，有的略作简单的整治，但大多根本未作加工，先钻后灼，占卜方法原始³⁰。同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址中也出有不少卜骨，但绝大多数是猪肩胛骨，只有少数的羊肩胛骨和更少的牛肩胛骨，而且几乎全部未经整治，无钻无凿，径直而灼，只有极少数的牛肩胛骨经过了整治³¹。而与二里头大致同时的先商文化时代，商族人们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占卜概念与技术，这是夏族人们所不能企及的。所以说，商族的骨卜的来源也与夏人无关。

那么，商族的卜骨占卜习俗究竟是从那里学来的呢？

中国早期甲骨占卜文化，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影响，是无容置疑的。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即曾指出：“骨卜习俗之原始及其传播在现代民俗学中仍为一未解决之问题。”“但就骨卜而言，除了孕育殷商期中国早期的朝代文化外，后来又东传至日本，北至通古斯及西伯利亚之海滨民族；历史时期的靺鞨民族也浸染了这个习惯；以后西播，直到爱尔兰、摩洛哥一带。”³²不过这是骨卜的长流，而不是其渊源。对于中国早期骨卜来源问题，应该寻找到更为古老的占卜材料。韩国学者李亨求考察了渤海沿岸、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出土的古代卜骨，结合有关文献的记载，认为骨卜的习俗起源于渤海沿岸北部及东北地区辽河上游支流西拉木伦河一带，而后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他的依据是，中原卜骨的考古学年代均不出龙山时代，而西拉木伦河流域北侧的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出土的鹿、羊肩胛卜骨，年代早到公元前3510年³³。而根据考古材料的显示，富河沟门遗址出土的卜骨虽然在年代上早于龙山时代，但不能算是最早的，目前已发现了比此更早几百年的卜骨出土³⁴。所以，李氏关于中国骨卜习俗源于渤海沿岸地区、从东北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观点，恐一时还不能成为定论。张秉权先生曾针对李氏观点指出：骨卜“这一习俗的原始发源地，究竟在哪里？似乎还需寻找更多的材料，才能下定论。目前，如果指定它在龙山或富河沟门，似乎都还言之过早。”³⁵

不过，李氏所说的渤海沿岸及东北地区正是我们所论的商族的起源地。李济先生也曾说过，“骨卜显然最初发源于那些饲养牛和鹿、而仍可能还是游牧的部落，但他们肯定还没有任何文字，却有着繁杂的仪式和迷信。”³⁶上古之时，东北地区的渤海湾一带正是一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的地方。起源于此的商族在早期时段也正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此地早期占卜之风较盛，这就不难理解起源于此的商族何以从商源阶段就有了骨卜习俗的出现。由

²⁸ 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第75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²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等《山东牟平赵格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³⁰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³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第28页、第49页、第99页、第14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³² 李济《〈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版。

³³ 李亨求《渤海沿岸早期无字卜骨之研究——兼论古代东北亚诸民族之卜骨文化》，《故宫季刊》，第16卷第1~3期，1982年版；《渤海沿岸之甲骨文化与韩国之甲骨文化》，《国际甲骨学学术讨论会》，第45~50页，韩国淑名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1995年版。

³⁴ 谢端琚《中国原始卜骨》，《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又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515页~5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³⁵ 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第31页，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年版。

³⁶ 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作者于1953年秋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做的报告，刊于Annals of Academia sinica, 1955, No. 11 Part 1.

此似可断言，商族是受其起源地及其周围地区固有的较盛的占卜风俗传统的影响，接受了骨卜占卜的习惯。在以后的迁徙、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更多部族占卜的习惯与技术，逐渐形成了商族独具特色的洋洋大观的占卜文化。

至于中国最早骨卜起源问题，则另当别论。目前所知最早的卜骨出土地点有两个，一个是河南省西南地区汉水上游支流丹江一带淅川下王岗遗址，这里出土了仰韶文化三期羊肩胛骨卜骨，卜骨不加整治，上有烧灼痕迹，使用年代在公元前 4070 年前后，距今约 6000 年左右³⁷；另一个是甘肃省武山傅家门遗址，考古学文化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出土卜骨 6 块，其中 5 块出自一座长方形半地穴式居址内，为羊、猪、牛之肩胛骨，卜骨不加整治，无钻无凿，尽是火灼，卜骨上还有阴刻单个符号“=”、“|”、“δ”等，年代在公元前 3800 年前后，距今约 5800 年左右³⁸。据此，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先生研究认为，卜骨的出现是以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和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出土例子时代最早，此后才在华北地区流行。以华北地区为中心，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不断扩展，作为宗教礼仪的占卜材料，从公元前 3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几乎都是使用羊、猪、牛等家畜的肩胛骨，特别是在陕西、甘肃等黄土高原地带，羊骨最多，其次是猪骨，牛骨比较少见。与此相对，在华北平原地区则没有羊卜骨而有牛卜骨，其反映的卜用材料的动物种属，当与地理环境及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³⁹。对于商族来说，其最早时期为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以其占卜用料没有定居农业部族所用的羊骨与猪骨，而有畜牧和田猎而得牛肩胛骨和鹿肩胛骨。这在商源文化的大城山遗址所出卜骨材料即可窥见一斑。

一些学者从宗教学的角度，对于原始骨卜的产生契机作了如下的推测：

关于骨卜的起源，无古籍记载可考据，但可以作如下推想。有一次人们在烧烤带骨的兽肉时，骨头炸裂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后进行的战斗得到了大胜，或狩猎丰收。于是烧烤兽肉时，兽骨炸裂成了吉祥的征兆。兽骨的炸裂是无意中造成的，后来人们就把他利用于占卜，以兽骨是否会炸裂为吉兆或凶兆。后来或许发生了这样的事：兽骨炸裂的吉兆不灵验，人们在寻找不灵验的原因时，注意到了裂纹的大小、横直、长短等情况，在无数次重复过程中，整理出了一套关于烧烤兽骨炸裂痕迹的占卜信条。到了这个时候，在偶然中产生的烧烤兽骨的原始前兆迷信，就发展成为有问题就随时都可以进行的一种占卜了。关于骨卜起源的这种推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想象，因为其他原始占卜的发生，也有相类似的情况⁴⁰。

这种推想，虽然演绎成分太浓，但对于事物原始状况来说，也无不道理。

马与牛一样，是游牧民族主要饲养家畜和牵引负重工具，是游牧文化的必备特征之一。但是在中国早期占卜包括商族早期占卜中，为何没有用马的肩胛骨作为骨卜的材料，这恐怕是跟当时中原部族和华北地区民族尚未有养马习俗有关，马肉不是人们经常食用的肉食恐怕也是其中原因之一。马对于中原部族和商族人来说，引进和使用的时代较晚⁴¹。到殷墟甲骨文阶段，马已经成为当时人们主要养殖家畜之一，但此时商人以牛肩胛骨进行的占卜习俗已成定型，已经发展成为制度性的东西。所以中国早期骨卜占卜中，没有用马骨作为占卜质料。

对于中国早期骨卜的形成与传播发展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最近日本学者荒木日吕子女士的一项研究作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对于商族占卜习俗的形成与发展研究，颇有借鉴的意义。荒木日吕子认为，卜骨是在龙山早期以粟为主谷从事猪、羊、狗、牛畜牧业的火田文化圈里产生出来的；龙山晚期卜骨与鬲在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以北广为流行，到二里头文化时

³⁷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第 200 页，又图版五三·8，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³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第 4 期。

³⁹ 冈村秀典《商代的动物牺牲》，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发掘 70 周年学术纪念会论文》1998 年版。

⁴⁰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⁴¹ 朱彦民《论商族对古代车马起源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代又扩大到鼎文化圈的二里头类型地区及鬲文化圈的山东岳石文化地区；卜骨的出土是在有集团规模的密集聚落的中心，多出自比较大的聚落或城邑，这些聚落或城邑统辖了周边地区的经济与政治⁴²。

收稿日期：2007-9-9

作者简介：朱彦民（1964—），男，河南浚县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⁴² 荒木日吕子《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卜骨及其社会意义》，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山东桓台，1997年8月。